

· 体认翻译学研究专题 ·

## 体认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

林克勤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摘要:**翻译学理论建构经过作者、文本、读者、解构、文化、生态等各阶段转向后已呈现出“认知”引领的趋势。认知翻译学在学界已渐成主流。基于本土化跨学科知识谱系,体认翻译学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体验互动与认知加工的结合。译者主体性是译论发展,尤其是文化转向以来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己任的体认翻译学的兴起,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其强调的意象图式客主二性解开了规范与惯习的纠缠,验证了语篇的元生成与后天翻译都是人类心智的有序波动;用体验性概念化修正了忠实与演绎的互在关系,以一体多义的识解框架释读了创造性模仿;提出整体隐喻观深度分析作为交际行为的翻译过程,实现了对目的论的超越。这对于新时期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和视界融合具有框架性创新意义。

**关键词:**体认翻译学;译者主体性;意象图式;体验性概念化;隐转喻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1-0156-12

### 0 引言

在翻译活动中由于存在着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转换过滤,因而译者主体性(查明建等,2003;屠国元等,2003;金胜昔等,2016)便成为了当代译论无法回避的命题,它是对译者担当角色的界定与描摹,亦是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由于译者也是第一读者,所以有学者也以译者(读者)中心论代之(胡庚申,2004;岳中生,2019),主要理由是译者在“译事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一定是中心,但多数学者为避免“中心主义”的误读仍然沿用译者主体性的表达。近年来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集中在语言学、修辞学、社会学、阐释学、文体学、典籍学、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学科交叉题域,重点考察译者能动性和创造性等主观学术轨迹,却忽略了这些轨迹均来自于译者与客观外在的互动体验。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立足于本土知识体系建构的体认翻译学(王寅,2021;张克定,2019)出发,强调译事不单是语言符码的更迭,更是文化意义的有效沟通,并凸显人类的思维、意识、价

收稿日期:2025-10-23

作者简介:林克勤,男,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体认语言学和体认传播学研究。

引用格式:林克勤. 体认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J]. 外国语文,2026(1):156-167.

值判断等精神活动其实源于身体体验和心智加工,以此检视译者主体性内涵的新变化新拓展。

## 1 意象图式对翻译规范与惯习的纠偏

翻译规范在译事中被注解为集体行为,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群体的共性特征。最为著名的翻译规范研究者是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图里,其《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Toury, 2012)是公认的翻译规范研究的集大成者。其后,彻斯特曼、赫曼斯、莎芙娜、皮姆等等众多学者又对规范概念进行了更具体、更细化的探讨。这些论述都指明了任何翻译活动和现象都受到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而不是译者的凭空想象、信马由缰。

翻译惯习则是对只重视规范的外在影响而未涉及译者内在心理与知识结构作用的补充和延展,它袭用了布尔迪厄社会学核心命题,强调了个体(译者)阶层实践、社会经历、经验背景、兴趣爱好等因素施动译事的效果。译者惯习明确了译者主客观立场的互动转换关系,指出个体惯习发挥了其在主观和客观世界张力之间的灵活适配作用,表明群体规范对翻译活动有一定的引领和制约,但个体惯习也会形成独特的翻译风格。

规范与惯习相继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焦点话题,二者互为因果,彼此施效,前者在对译者加以约束的同时也帮助个体风格的形成,后者则延伸、补充、完善了前者对翻译活动的解释力(徐敏慧, 2017:16)。这一对概念的探讨阐释虽然对于解决翻译过程中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主客观二元对立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遗憾的是仍然没有把翻译视为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尚未真正揭示出译者在与外界积极互动的基础上大脑如何形成抽象、整合范畴、发挥映射并实施主体性翻译行为。

作为一种后现代译论,体认翻译学认为意向性可以更好地回答规范与惯习这对范畴在翻译过程中的关系纠结问题。作为人脑自然呈现的一种属性,意向性被认为是一种实意识。它是归类于心理活动的一种特质,内在的意向性总是勾连外在他物,即人的心理意识往往关联到客观世界中的某个物体。

塞尔(Searle, 1983:2)指出:“意向性是很多心理状态或心理事件的共有特质,这些以虚拟形式存在的状态或事件通过意向性关涉或映射到外部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对象。”这充分描摹了意向性以人的心智关联外部事物的指涉倾向,也就是说,意向性兼有覆盖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含义,它一头联着虚拟世界(精神、意识、思想),一头朝向实体世界(事物、事件、存在)。

意向性的实体定位是根据事物在环境中的位置、形状、颜色、性质等与译者意象状态描述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契合,译者要始终保持与客观世界各因素的联动,这是译事中意向状态得以实现的基础。意向性的虚拟定位则更加曲折隐形,它跃升到了人类思想的高处,不

仅可用于解释译者惯习,更体现为整体意图引领下译者对个体语言文本的查漏补缺。

在翻译文本的理想化意向性网络中,那些读者以为突如其来的语言现象可能是译者有预谋有计划的设定,人物的言语行为和意象发展均遵循译者思维渐进发展,文本中的意向状态都可以在这个理想化意向网络中找到诠释自身的条件和因素(刘彬等,2025:156)。故此,翻译意向性就是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之间多重主体基于语言和思维的博弈,而在这一过程中原文与译文的信息总量往往保持一种动态的守恒。

体认翻译学结合了康德的“图式”术语和梅洛·庞蒂的意向性,强化了“意象图式”这一概念,以说明主客观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形式。意象图式是对意向性的模型化描摹,它是从人们的反复体验中获得抽象意象并提炼出的结构性组织,它使得意向性中的各种关系相对稳定地呈现出来,从而逐渐固化为团体普遍接受的共享性体认媒介。

陆俭明(2009:103-107)认为意象图式“通过感觉器官感知而形成意象;在认知域内进一步抽象而形成意象图式(概念范畴);该意象图式投射到人类语言,形成语义框架。”王寅(2021)则强调意象图式具有体验性、想象性、抽象性、心智性、动态性等特征,它是人们对事物和事件反复感知体验,不断进行概括而形成的一种抽象的心智结构,是介于感觉、知觉和思想、判断、意识之间的关键环节,也是形成语法构式、生产文本意义的主要来源,更是认知事体、理解世界、建构知识的必由之路。雷科夫和约翰逊甚至试图用27个最基本意象图式来总括人类的概念系统和知识结构,这说明意象图式在语言学家挽救“义素分析”的使命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

体认翻译学认为,译事不仅仅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建立联系,更是心智层面上意象图式裂变、组合的结果。译者通过大量社会实践与信息加工获得一定的意象和意象图式之后,便在大脑中铸就了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若干个相关的认知模型合并后成为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Lakoff et al.,1999),即一种描述实体属性及其逻辑关系的基础概念网络,继而搭建起奠定于空间体验的动态认知框架(如容器图式、路径图式等)。而事件作为人类经验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元要素,又驱动了概念范畴的心智涌现。事件图式(Event Schema)概念是“把最显著的参与者和某种类型的行为或状态相结合而生成的,那些参与者在该行为或状态中充当不同的角色”,据此形成基本的句型(Dirven et al.,2004:110-113)。威廉·克罗夫特(Croft,1990)则提出了事件理想化认知模型(Event ICM)。这些以“事件”为中心的认知图式解释了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抽象化凝练会因不同维度、不同视野、不同主体的文本加工,如何造成言语行为各层级上的语法、句法和语义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上述理论模型在剖析这些语言现象时各有侧重,提供了相应解决方案,但未能呈现统一的完型框架。

王寅(2005)对以上观点进行了修补,推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实现了对意象图式论的

理据创新。他认为,在事件域中,各种要素(如静、动,具体、抽象,繁、简,高、低,内、外等)塑造了一个叠床架屋的向度网络。在语言表达与认知加工的过程中,这些要素相互渗透、彼此互文以及裂变重组,从而达到译者预先设定的语用效果。这种同级要素甚至跨级要素之间的裂变整合或者指代迁移,为一词多义、词性转化、词义变迁、反义同词等诸多语言表征厘清了其来源机制。由此,人们通过行为(Action)和事体(Being)这两个动态和静态的类型集合形成记忆模块,储存于心智之中,形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体认方式。而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言语行为方式,不论是文字转换、修辞润色还是风格描摹,都离不开意象图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意义生产。

意象图式的客主二性验证了语篇的元生成与后天翻译都是人类心智的有序波动,原文语篇是作者运用抽象概念与外界事物之间建路搭桥的产物,译文则是译者在对源文本进行体验认知加工后再经范畴整合、对外输出的结果。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依据意象图式进行知识谱化和价值建构的一个序列。

## 2 体验性概念化对忠实与演绎的修正

传统译论在涉及译者主体性命题时一方面要求译文与原著保持一致,即坚守译者的天职——忠实。这就要求译作与原著应达成形神合一的状态,准确传达原著的神韵和精髓,不可貌合神离甚至完全悖逆。当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隐身,让位于作者或文本,而是应始终在场,掌控全局。另一方面,也允许译者在一定条件下对原著施加个性化的理解、延展、阐释,但这种理解、延展、阐释并非从心所欲,而是以忠实于原著为唯一前提的,因此译者也被称之为戴着镣铐的舞者。

许钧(2003:11)对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主体性的解释是:“所谓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即译文的价值。而‘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

其后许多学者都论及在异化与归化的争论中要秉持“允执厥中”的立场,“理想的做法是将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融合并用,使归化和异化达到动态统一。在操纵和反操纵,投降和拒绝投降之间还存在模糊灰色地带,应该允许翻译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多元共存”(王宏,2012:26)。

体认翻译学认为翻译首先是一个如何理解源文本的行为,但这并非要求译者与源文本完全合一,而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恰如谭载喜(1999:180)在论及奈达翻译思想时强调的那样,“事物不仅仅是事物,词语也不仅仅是词语,它们总是要受到与其相关联东西的影

响,因而其意义也总是要根据人们的感情反应来估价。”显然,事物、词语是“体”,与其相关联的东西就是“认”,人们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都离不开“体”与“认”这两大法则。例如,宋代苏轼的传世名篇《题西林壁》就传递了这种朴素的体认逻辑: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正是因为观察者与事体之间的关系各异、距离远近、情感联结,同一个庐山便在人们脑中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但它依然是山、岭、峰,而不是河、木、土。在客观环境中其自身性质并没有改变,而在不同观察者的眼中其表征却是氤氲万千,忽隐忽现,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判断标准。

兰盖克(Langacker, 1987: 128)在《认知语法基础》一书中分析了语言主观性问题以及人们面对客观对象如何形成个性化的具体方案,他称之为“识解”(Construe),其内涵可以表述为——人们拥有以不同方式诠释同一场景的能力。主要以“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凸显”等五个指标来阐明为什么面对同一场景和事物人们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产生各种差异化文本,即一体多义,也可以据此来解析译者主体性发挥作用的相关机制。其中,详略度是译文表现出来的对原文的细化或简化处理,辖域与背景标示文化、习俗和历史对译文的影响,视角则涉及句型变化、词类互换以及参照点迁移等等,凸显意指译文聚焦的某一具体事物或场景,并吸引读者的关注。在这五个指标中,凸显最为重要,它决定了辖域和背景,因为它是基于这二者而产生的;而从不同的视角审视译文,就会有不同的凸显对象;详略度则为凸显的结果、译文的细化、增添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译文的删减则是用奥卡姆剃刀裁去可忽略的内容。

凸显的过程其实就是译者注意力分配的过程。认知心理学认为,注意力是一种认知资源(傅罡, 2024: 22)。当有多个任务同时使用注意力的时候,有可能出现资源抢占的情况。神经科学家也发现,“竞争”在神经元层面依然存在——注意力决定了哪些内容能够在信息处理中得到优先或详细加工。因此,凸显是翻译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大脑面对的是远远超过自身加工能力的海量信息,加之注意力资源有限,不同内容之间就会产生竞争宝贵资源的情况,在凸显的选择下,获胜的内容将得以控制译者的知觉和行为反应。这些吸引译者注意力的动因可以是文本的特征、语篇的风格、瞩目的空间位置,也可以是作者的知识背景等等。

兰盖克的识解观用一体多义来修正忠实与演绎的关系,跳出了持续千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二元争论陷阱,把主客观、作者译者文本融合起来进行剖析,开辟了译者

主体性研究的新视野,实现了传统意义观向认知意义观的转变。但兰盖克的意义“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专注于言说者主体性的发挥,有拔高人脑认知加工的效能之嫌,遮蔽了体验镜像与主客互动对语言的影响。因此,体认翻译学把一体多义的识解发展为“体验性概念化”(王寅,2021:290),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标注语言、意义、理解、翻译的客观性,一面代表语言、意义、理解、翻译的主观性。二者栖息于一体,表里相衬,互为补足。

古诗《枫桥夜泊》在国内外有40篇英语译文,运用体验性概念化方法就可以大致判断译文是否合乎源文本的真义(王寅,2008:213)。例如,这40篇译文中关于“渔火”的译法大概如下:

(1) dimly-lit fishing boats(打鱼船上的昏暗灯光)

the lights of fishing boats;

fishing boat's lights

boat lights

(2) fishing lights(捕鱼的灯火)

the fishing torches;

the fishing lamps;

fishing fires;

fishing lanterns

(3) fishermen's flares(渔夫的灯火)

a fisherman's lamp;

the fisher' lights;

fishermen' fires;

fisherman moves with his torch

根据日常生活实践进行判断,第二类译法可以指打鱼船上的灯火,也可以指捕鱼时的灯火,即吸引鱼儿过来的灯火;第三类译法则比较含混,既可能是渔民在打鱼时设置的灯火(诱饵),也或许是渔船上用以照明的灯火。因而,经过比较之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类译法比较符合我们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是较好的译本。

翻译过程中的体验性概念化是译者创造性模仿的言语行为。由于翻译并非原创,故此对源文本的模仿不可避免,但译者创造性亦不可被抹杀。詹姆斯·马丁(Martin, 2010)指出,直接复刻、模仿源文本的客观翻译是做不到的,一般都会遇到语言文字障碍、体认方式区别、异国文化理解以及读者能否接受等林林总总的问题。但这种情况下,译者主体性并不等同于自由发挥,而是表现为有一定限制的创造力迸发。模仿更为看重对源文本的忠实,创造则突出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然而,模仿可以追求逼真,但不必奢求一致;创造可

以出奇,但也是有规则的。二者砥砺支撑,命运与共。与此同时,译者也必须注意到,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不尽相同,有些差异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在翻译中体现出来,有些差异则具有较大的不可译性,这会使得翻译的“再现性”功能备受考验。

### 3 整体隐喻观对目的论的超越

翻译曾经在语言学阴影下纠结于译出语文本词句的量身定做,在目的论提出以后则转向以语篇为研究对象,突出翻译的交际功能,从而大大推动了译者主体性的发展。

莱斯率先将功能主义引入译学研究,冲破文本对等论的规制,以功能重于对等、需求指导行为的原则首创翻译批评,建构了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论。她的学生弗米尔(1989)在接受美学启发下,试图摆脱源文本中心论束缚,提出了“目的论”,认为译事最高标准是达到何种目的,为此可以执行不同的策略,采取相应的技巧,突出了译者主体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直译异译的长期之争给出了一个答案。莱斯的另一位学生克里斯蒂安·诺德(Nord, 1991)在综合评估功能学派的各种不足后更进一步,把翻译视为人类的一种交际行为,高扬语篇连贯产出意义、意义让位于功能的旗帜,细分译学目的范式,采取针对性策略手段,再度巩固了译者主体性的学界地位。

目的论促成了译学的第四转向,为翻译学成为一个与语言学并驾齐驱的学科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它也有体系不够完整的短板,基本局限在以语篇为中心奠定翻译交际价值的狭窄地带,尚未意识到“翻译即交际”这种跨域表述其实就是一种隐喻手法,并进而总结出隐喻作为一种贯穿译学的认知方式的统摄作用。

隐喻在传统上是被纳入修辞学体系的,即使在应用于翻译之中时也把它和译论割裂开来,突出其独立性或者使其降格为碎片化,即把隐喻置于句子、语段或者语篇之中来锚定其地位和价值,解析其文化差异,展示其指代过程,分析可译或不可译的依据,制定转换手段,或者从认知层面深入挖掘可译与不可译的理据。这种搁置在可控状态之下对译学规律的探寻,其实忽视了隐喻与译学本体的内在相关性,并未抵达隐喻交际的根本所在,有可能导致研究与实践脱节而失去其方法的有效性(周红民,2020)。

彼得·纽马克(Newmark, 1981:84)把一切语符都看成是关于客观事物的隐喻或转喻,即所有词汇都具有指代性。由此可以推断,译事即隐喻,译入文本和译出文本都离不开译者母语和外语的相互释读,或用新的隐喻去映射原来的隐喻。鲁斯·埃文斯(Evans, 1998: 149)的看法大致类似,“有时译文本身就可视为外国原文的隐喻,正如乔治·拉巴莎指出的那样,一个词就是一个物体或另一个词的隐喻,翻译就是一种形式调配,使用新的隐喻去映衬原文隐喻。”翻译过程中隐喻的无处不在,或者说翻译即交际本身就是隐喻形态(根隐喻),为译者主体性增添了颇具吸引力的理论色彩。

体认翻译学综合借鉴以上学者的观点,结合本土知识实践,以隐喻整体观审视翻译即交际这一论断,打破了目的论对表象的礼赞,为译学理论开辟了新的意义空间。其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隐喻即译学思维。乔治·雷科夫和马克·约翰逊(Lakoff et al., 1980:3)在体验哲学的三大原则中明确指出,人的思维具有隐喻性,“隐喻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地方。它不仅在语言之中,而且在于思维和行动之中。我们据此思维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主要具有隐喻性”。思维的隐喻性发端于体验。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身体经验会逐渐形成认知格式塔,即包含各种具体结构的整体心智。由感知运动促发的大脑认知格式塔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并能隐喻性地扩展以理解更加抽象的领域(刘正光,2007:48)。

不过,雷科夫和约翰逊把隐喻思维看成是无意识产生的,并不需要人们有意识地习得。关于神经元运动层次的研究已经说明了这种自发联系产生于人类早期的运动感知系统与主观体验和判断的结合。他们进而指出,人在生命的萌芽阶段,基于生存方式会自发地、无意识地获得一个庞大的基本隐喻系统同时由于并存时期形成的神经联系而使用无数的支隐喻进行思维。《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列出了82条概念隐喻(用全大写字母书写),作者认为这大致涵盖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没有这些隐喻人们不可能认识世界,也不可能认识自己本身。

雷蒙德·吉布斯(Gibbs, 1994)列出了隐喻思维发挥作用的四个研究假设。这些假设在人们对语义的理解和其语用实践中体现了互文性关联,但在个体经验和日常语言产出上作用有限。他认为这些假设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形成了一个把隐喻思维模式与语义理解和语用活动方面关联起来的各种可能性量表。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中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证实了上述的一些隐喻思维假设确实发生在人们的交际活动中。

其后,大量的隐喻思维文献理据使得隐喻逐渐在译学体系中登堂入室,上升到了人类意识和世界观层面,而不再被弱化为实操性的修辞手段。

(2)隐喻即换装。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译文想要完全表达出与源文本一致的意思是不可能的,经过译者的认知加工,必然有所变化、调整、增删。因此,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换装”。鲁迅(1935)在论及翻译时说道:“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剝掉他的眼睛。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需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西方译论中亦有“忒修斯船之谜”的说法(Tymoczko, 2002:179)。忒修斯为古雅典国王,其乘坐的船因船板损坏漏水需要更换,当所有船板被更换后,大家会认为这条船仍然是原来那条船。但吊诡的是,当废物利用的旧船板重新组合成一条船后,放置在原来那条船的旁边,大家就不会认为这是原来的那条船了。那么,这两条船又是什么关系呢?在译者看来,新船板构成的那只船就是译入语文本,它替

代了那些拆下来的破旧船板,而原本由破旧船板构成的船就是译出语文本。这两只船的关系就是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关系。

隐喻在译事中的运用就是把难以理解的文本或词语撤下,换上读者比较容易理解的文本或词语。如老子的《道德经》迄今为止共有 386 种英语译文(郭翠红,2024:152),核心概念“道”的翻译是其中的关键,但中国文化中的“道”博大精深,虚无缥缈,难以表达,在汉语中都很难解释清楚,有不可说之名,何况翻译成英文呢?这时候就需要给“道”换装,穿上一件方便异文化读者理解的外衣。因而,我们就看到译者们大显身手,倾力用具象的喻体去映射那个抽象的、模糊的、高高在上的本体,代表性的如下: The Universe、Cosmos(宇宙)、Creator(创造者)、Existence(存在)、Fate(命运)、God-the-Father(上帝天父)、Harmony(和谐)、Heaven(老天)、Infinity(无穷)、Law(法则)、Natural(自然)、the Principle(至上规则)、The Way、Road、Route(直观的道路)、The Spirit(最高精神)、Taoist(直译为“道”)等等。有学者倾向于对这种内涵丰富、民族特色突出(异文化中没有对应物)、极难翻译的文本采取音译法,即把“道”译成“DAO”“TAO”“TAOIST”等,但不可否认,那些多样化的隐喻具象其实也赋予了“道”更广阔的内涵,同时反映出译者们殚精竭虑付出的努力。

(3) 隐转喻共存。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样的说法,隐喻是跨认知域的结构映射,转喻则是相同认知域的彼此互释。二者的区别在于转喻基于邻近(连续体),而隐喻基于相似(家族成员),或者说隐喻机制是宏观层面的,转喻机制多见于具体实践(Jakobson, 1956: 56-82)。但也有不少学者把隐喻转喻归为一类,都是从一个认知域映射另一个认知域的语言现象,不存在跨域或者同域的问题。

体认翻译学认为,作为译者主导下的人类交际活动,该过程既涉及隐喻,也包含大量转喻,其实在使用中往往分不清用的究竟是隐喻还是转喻,所以只能称之为隐转喻(Metaphonymy)。隐转喻可形成连续体或共存模型(Driven, 2002)。路易斯·古森斯(Goossens, 1990)指出隐喻和转喻可以相互包含或相互衍生。在译事体系中隐转喻的应用随处可见。例如,周而复小说《上海的早晨》第4卷中有这样一段话,“问题是怎样才能追捕大贪污犯呢?要打大‘老虎’,首先要把中小‘老虎’搞清楚,这样大‘老虎’的尾巴就露出来了。”翻译成英文是这样的:“The question is how are we going to set about catching the big bribe-takers? If we're going to get the big tigers we must first know all about the medium and small tigers, for once we know that the big tigers' tail will be revealed.”译文用大大小小的老虎指代贪污犯,老虎尾巴指代贪污线索,这在中文语境中读者是明白的,也就是一种转喻;但跨认知域后国外读者能明白吗?其实这个忧虑是多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文外宣翻

译的不断成熟,国内外主流媒体使用“打老虎”“拍苍蝇”之类概念、意象的频率越来越高,早已经成为融通中外的隐喻创始源,并逐渐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接受(宫宇航,2023)。

王寅(2009)指出,转喻在译事中的元体认机制是滤减像似性,它包括三个行为过程:

由于身在“此山”之中,人类不可能穷尽一切奥秘,只能像盲人摸象那样认知世界其中的一部分,并以此指代整体;

当认知结果转化为语言表达时总会受到种种限制,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

在给事物命名时不可能概括出其所有特征,只能抓住最主要(最显著、最方便、最接近)的那个,从鸭群嬉戏判断春江水暖,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以上三个都是转喻的过程,可以称之为命名转喻观。滤减像似性决定了无论我们怎么选择,隐转喻也只能对源文本进行模糊的、不确定的描述,不断发掘新的意义去转述旧的意义,而不能做到同时对等呈现。

汉英互译中经常出现“整代部”“部代整”和“部代部”等隐转喻情况,其中最能体现滤减像似性原则的是“部代整”,即用部分特征去映衬事物整体。如“桂林山水甲天下”是非常大众化的表述,中文读者都很清楚这说的是桂林的风景名胜优于其他地方,译成英文后前四字就成了 Guilin's scenery,显而易见,这是以“山水”具象指代一个地方的所有风貌。“她每天都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操心”翻译成英文则是“*She has to worry about daily necessities every day*”。柴米油盐酱醋茶映射的是生活必需品,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住房、衣服、肉类、蔬菜、交通、工作、教育等等,因此英译则用 *daily necessities* 来涵盖。前述有关“道”的翻译也是采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因为“道”实在是太难以捉摸了,只好用隐转喻突出其一个方面的特征(如神圣、虚无、严谨、包容、连接、原初等),并以此映射“道”的本体内涵,这就是跨文化跨语言文本交际中译者主体操控内容信息的不断滤减。

#### 4 结语

译学是人学,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但这个主观能动性从哪里来,当然绝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正确的答案是从客观世界中来。马克思(2012:112)在谈及观念的产生及其本质时说道:“观念的东西不外是从外界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已经明确了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观点、思想、意识均产生于人与外界的体验互动与心智的认知加工,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体认翻译学以社会实践为经验基础,同时强调译学理解与表达的多元化、广视角和人本性,用意象图式、体验性概念化和整体隐喻观剖析翻译交际的全过程,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打

开了新的知识之窗。

参考文献:

- Croft, W. 1990.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rven, R., M. Verspoor & J. D. Chen. et al. 2004.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Dirven, R. 2002. Metonymy and Metaphor: Different Mental Strategies of Conceptualization [G]//Dirven, R. & R. Pöring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Evans, R. 1998. Metaphor of Translation [G]//Baker, M. & G. Saldanh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Gibbs, R. W. 1994. Figurative Thought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G]//Gernsbacher, M. A.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Goossens, L. 1990. Metaph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 for Linguistic Ac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323-340.
- Jakobson, R. 1956.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G]//Jakobson, R. & M. Halle.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I*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R. M. 2010. 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G]//Shreve, G. M. & E. Angelon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Newmark, P. 198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Nord, C. 1991.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Model of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M]. Amsterdam: Rodopi.
- Searle, J. R.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ury, G. 2001.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 Tymoczko, M. & E. Gentler. 2002. *Translation and Power* [M].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Vermeer, H. J. 1989.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G]//Chesterman, A.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Helsinki: Oy Finn Lectura Ab.
- 查明建, 田雨. 2003.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1): 21-26.
- 傅昱. 2024. 人工智能注意力机制: 体系、模型与算法剖析[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 官宇航. 2023. 中央文献翻译中的隐转喻互动研究[J]. 外语研究(5): 56-62.
- 郭翠红. 2024. 《道德经》151年英译史述评[J].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1): 152-159.
- 胡庚申. 2004.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3): 12-18.
- 金胜昔, 林正军. 2016. 译者主体性建构的概念整合机制[J]. 外语与外语教学(1): 116-121, 149-150.
- 刘彬, 冯家慧. 2025. 意向性理论视域下翻译动态性研究[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1): 152-159.
- 刘正光. 2007. 隐喻研究的三个层次与主要领域[J]. 外语学刊(3): 45-51.

- 陆俭明. 2009. 当代语言学理论与汉语教学[J]. 世界汉语教学(3):391-39.
- 鲁迅. 1981. 且介亭杂文二集[M]//《鲁迅全集》第6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谭载喜. 1999.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屠国元,朱献珑. 2003. 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 中国翻译(6):10-16.
- 王宏. 2012. 走进绚丽多彩的翻译世界[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王寅. 2005. 事件域认知模型及其解释力[J]. 现代外语(1):17-26+108.
- 王寅. 2008.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力——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篇英语译文的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3):211-217+241.
- 王寅. 2009. 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J]. 哲学动态(10):84-89.
- 王寅. 2021. 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J]. 中国翻译(3):43-49,191.
- 王寅. 2021. 体认翻译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许钧. 2003.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 中国翻译(1):8-13.
- 徐敏慧. 2017. 从翻译规范到译者惯习:描写翻译研究的新发展[J]. 中国翻译(6):11-17,129.
- 岳中生. 2019. 译者生态位与“译者中心”[J]. 上海翻译(4):14-18,94.
- 张克定. 2019. 体认原则及体认者、现实和语言的相互关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71-80,158.
- 周红民. 2020. 文本的功能类型与隐喻翻译[J]. 上海翻译(4):32-38.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编写组. 20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LIN Keqin

**Abstract:** Translation theory has evolved through stages focusing on the author, text, reader, deconstruction, culture, and ecology, ultimately leading to a cognitive-oriented approach.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ased on a localized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framework,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experiential interaction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has been a key focu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particularly since the cultural turn. The rise of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with its commitment to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has provided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Emphasizing the agent-patient duality within image schema,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unravels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norms and conventions, demonstrating that both the meta-structure of discourse and subsequent translation are orderly fluctuations of the human mind. Experiential conceptualization revi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delity and adaptation, interpreting creative imitation through a polysemous 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 Moreover, it introduce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overarching metaphors as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communicative acts, thus transcending the teleological approach. Thi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framework of inter-subjectivity research and horizon fus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image schema; experiential conceptualization; metaphonymy

责任编辑:朱晓云